

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周年 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2017年,正值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周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于5月12—13日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任教3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以学术论文报告、主题圆桌研讨的形式进行,来自海峡两岸的经济学学者400余人参加了会议,来自五湖四海的经济学家送来祝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从美洲发来祝贺视频,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孟加博士从非洲发来祝贺视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若素教授从澳洲发来祝贺。从全国各地回来的经济学学者以及林毅夫教授的学生们回顾了林毅夫教授从教30年来在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教育、改革发展政策所作出的贡献,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脉络和学术成果。与会人员在谈起与林老师的轶事时总有道不完的回忆。5月12日为大会,5月13日为分论坛,分论坛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拓展与深化,包含三场主题演讲、三个分会场33篇专题报告。

5月12日上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以及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分别致辞,致辞环节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胡大源主持。

郝平回顾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研究与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希望年轻一代北大认真学习林毅夫教授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严谨学风,学习他不忘初心、报效祖国的深情情怀,学习他孜孜不倦、培养英才的执着努力,要像林毅夫教授那样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正道而行,勇于担当、知行合一。

蔡昉从三个角度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发表了看法,第一,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第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益创新,提供了中国智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第三,林毅夫教授是最能够称为“努力实践”的中国学者,其所做研究和努力让人联想到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陈锡文指出,林毅夫教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那就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不多见的有家国情怀,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以贯之”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

姚洋以三种身份谈了对林毅夫教授的感受,第一种身份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创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其坚持的“教授治院”方针是最宝贵的学院文化。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结合其他学科力量一起来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定。第二种身份是学生。在与林毅夫教授交往的30年中,自己学到了很多,其中最宝贵的还是对祖国的执着情怀。第三



种身份是同事。不知不觉间做同事已经20年,林毅夫教授对现实的思考、政策建议、理论创新都来源于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照搬西方书本上的知识,这是对做经济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姚洋教授同时代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代表林毅夫教授第一批学生,祝愿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设和发展上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郑国汉谈到林毅夫教授学术研究成果沛然,多次在领先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令人佩服。其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最近十年来出版多本英文和中文专著,大部分都是由世界顶级大学出版。林毅夫教授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和经验通过著作、演讲,以及世界银行和南南学院系统地介绍给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在全球范围发挥软实力的好例子。

国务院参事、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杜鹰发来贺信,对林毅夫教授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硕果累累的学术成果表示敬佩,并祝贺林毅夫教授梦想成真。

随后,林毅夫教授就“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发表了主旨演讲。林毅夫教授首先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想法,扬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中国经济学界创新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国的经验与现象,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过去的理论往往解释不了新的现象,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与经验,深刻研究中国现象,从中提炼基本发现规律。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论基本原理,马克思唯物史观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总结社会进步的基本道理。理论创新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有用现代经济学的

研究范式,研究成果才能与世界经济学界交流、沟通。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需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有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级是内生的,要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要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向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升级,就要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最后林毅夫教授谈到要实现“知行合一”,觉得“知行合一”是不够的,因为社会科学家的“知”到“行”不能达到,不能成,同时指出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是“唯成乃真知”,其提出的理论只有在指导实践取得预期的成果,这样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因而提出“知行合一”。并且林毅夫教授最后用四句话来总结,“因行获知”,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现象,现象是行动的结果,因为有这些“行”,可以得到“知”;“用知践行”,知识分子获得知识的目的是要在实践上指导行为。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所以要“以成证知”,按照这个理论指导去做能成功的,才能证明你的认识是对的。最后是“知行合一”。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又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有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一套新的理论,用这套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同时也可以帮助跟我们一样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让他们实现跟我们一样的经济的蓬勃发展,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理想境界。

林毅夫教授主旨发言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分别作了点评。

张军谈道,新结构经济理论的构想要具有远大的目标,不仅要拓展现有的研究范式,而且要建立一套关于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新理论。史晋川认为,林毅夫教授回国30年从事的研究,学术的视野、本土化的意识、丰硕的研究成果等都是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的激励,他树立了一个榜样,敦促中国经济学研究立足本土,走向国际。周皓指出,中国金融研究方面存在着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目前的金融学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指用中国的例子来做金融研究,中级阶段是研究中国的金融问题,或者说带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研究,高级阶段才是做具有中国范式的金融研究。他希望在新的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金融研究能够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清华五道口金融研究院合作成立“新结构金融研究中心”,就是要把中国金融经济学的研究从初级阶段推向高级阶段。

卢锋从四个方面回顾了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自原创理论体系成功的原因,第一是历史的背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这样大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林毅夫这样有家国情怀的经济学家。第二是林毅夫教授承载的学术发展历程。卢锋指出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成型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思考探索,包括1985年开始做农村改革的研究,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经典文献,以及80年代中期做的很多工作;第二个阶段是初步形成框架,以《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一书的出版、增订版与再版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从90年代后期到去世界银行履职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充分信息与企业的改革》、《自生能力、经

济发展与转型》等书的出版,提出了“自生能力”这一重要概念,从而把对中国经验的思考上升到抽象理论的高度;最后阶段是进一步提升,是到世界银行工作、到非洲大量考察研究之后,出版了一系列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如《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等。第三是研究方法方面。林毅夫教授善于概括研究重大的问题,而不是一些简单问题,对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比较优势的研究都是大问题,并且重视方法论,善于把经济现象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第四是林毅夫教授有非常人可比的热情和激情。谈到经济学理论,研究总是滔滔不绝、兴致勃勃、激情四射。

黄益平最后特别带来了邵若素从澳大利亚送来的祝福,并带来邵若素在《澳大利亚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对林毅夫教授观点的评论文章。

5月12日下午的四个分论坛群星闪耀、妙语连珠,共有来自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林毅夫教授同时时期的学生就“林毅夫教授与经济学研究”“林毅夫教授与改革发展政策”以及“林毅夫教授与经济学教育”等主题抒胸臆、忆往昔、望未来。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雷鼎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晔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刘守英、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凯南、北京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森、台湾高雄大学经济系蔡颖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鞠建东、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副书记李文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斌开、华南理工大学孙希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候选人沈仲凯作了精彩发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森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徐佳君、学术副主任王勇、办公室主任陈曦主持分论坛。

答谢环节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主持。他总结说,企业家里有一句话,伟大是熬出来的,没有长时间的向一个方向的努力,很难留下任何痕迹。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人生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自己也讲不清楚,就不是那么认真了,无非是谋生手段中的一种,随波逐流,适者生存;第二种是自己当真,遇到当真的人也当真,遇不到就算了;第三种是自己当真,遇到当真的人当真,遇到不当真的人也当真,他始终相信不当真的人心里也有一个当真的火苗,你只要认真地持之以恒、苦口婆心坚持下去,一定会让这个这个世界变得认真起来。他说他认识林毅夫教授好多年了,林毅夫教授就是三种态度的人。林毅夫教授没有认为这个世界有谁不当真的,再不当真的人遇到他,他一样真地来来回回地讲,一以贯之,认真到底,当真到底,这就是最值得大家好好学习的地方。最后分论坛在林毅夫教授动情的答谢辞中落下帷幕。(宗和)

邹东涛的学术思想、诗词情怀和多元人生

刘丹

1993年8月,《经济日报》发布了一份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领导干部的广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一位司局级领导干部。此时,刚刚从陕西安康市汉阴县走出来的邹东涛,正在北京大学作厉以宁教授的访问学者,闻之此事立即前往报名,排序最后一位——第八十六名。但考试及面试成绩是第一。就这样,他成了中国解放后公开招聘“入仕”第一名。

199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经济学家李成勋教授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从“四大名旦”到“进京三杰”:中国经济学家后浪推前浪》,邹东涛被列为“进京三杰”之一。邹东涛,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人,1949年11月出生,一个省工工商业家庭,中共党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国务院项目下放专家组成员,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他的履历比同龄的多数人都“复杂”,他的学习经历是自高中毕业后总是“工作→上学→又工作→又上学……”,1971年成为县政府财政局的正式干部,1973年考入西北大学物理专业,1976年毕业,被分配到安康五七干校(后转党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1983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经济学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

1978年12月31日,由理转文自学经济学几个月的邹东涛就在《安康日报》发表了他的经济学处女作《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其提出的改革开放与该会议精神一致。



1993年8月,如文章开头所述,邹东涛成功考入国家体改委,担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1994年国家体改委“国有企业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邹东涛担任副组长。每年一次上报国务院的国有企业改革试点报告由他执笔。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家体改委,邹东涛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在这个岗位上,高端教育和科学研究集于一身。随后,他的工作又变动了几次。但他始终坚持“两个不动摇”:一是坚持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不动摇;二是坚持从事经济体制改

革和发展研究不动摇。

邹东涛好像天生就有万事“寻根究底,说出道理”的干劲,而且“决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他认为“创新”是思想者的灵魂。在《创新型社会科学人才:“十字型”人才》一文中,他把社会科学人才分为四种类型。另外,他先后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出版十余部著作,主编150余卷丛书,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坚持不懈地创新、创新、再创新。

1998年5月,邹东涛应邀到武汉参加“全国中青年学者改革研讨会”,为会议写了《改革的理论和理论的改革》一文。

1991年,邹东涛完成《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一书,尖锐地批判了当时以“市场恐惧论”等处于主流的保守主义思想和政策,提出“中国应该且必须高速度”的观点,1992年出版。

同时,邹东涛认为当时的中国只有搞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于是他组织编写了《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十四卷。此书的出版正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与全会通过的相关决定一致。

他的《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两卷)收录了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撰写的关于改革方方面面的论文。《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一书,被人们推崇为带着故乡西部感情、“用双脚写出来”的著作。

邹东涛“既是国家干部,又是专家学者;文理兼备,多元人生”。2005年,著名人文传记作家蒋晖撰写了《邹东涛:超经济的经济学家》一文,对他的描述十分贴切。

邹东涛先后被西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聘为博士生导师,他把很多精力花在培养学生方面,迄今已经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百余人。若算上党校工作给领导干部上课、大学给本专科生上课,社会上给各种“讲习班”上课的学生,就难以计数了。

邹东涛“工作→上学→又工作→又上学……”的经历,使他总是满脑子“实践”。他所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一文,反映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造诣和思考;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提出了“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他坚决拥护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先后发表《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和《三个和尚没水吃》等文。

2005年10月应邀到美国出席“旅美中国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第11届年会”,在会上作了《“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主题演讲。巧妙回答与会人员的刁难,使会场顿时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1986年撰写了《民权本位论》和2006年提出了“民本社会主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康辉现场直播采访时提出:“民生是个纲,纲举目张”。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经济学的国民性》一文。

邹东涛祖上曾留下来不少古书,使他耳濡目染,喜好文史,十岁左右写诗,小时候,周末上山砍柴是文的基本功,他曾作自由体诗《砍柴歌》,反映了少时艰苦中矢志不渝的乐观主义情怀。

同时,他从小就喜欢“梦幻人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后,他填了一首词《满江红·大梦无边》——

大梦无边,风雷电,神州亮剑。
五千载,改朝换代,沧海巨变。
古老华夏大一统,雄关漫道冲霄汉。
展望那,两个一百年,情无限。

梦发展,梦逐愿;
梦家旺,梦国灿。
梦华夏复兴,东风扑面。
中华民族大崛起,梦中笑醒三百遍。
驾神舟,俯瞰梦倚天,红旗漫。